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庄锡华/著



中国现代 文论家论

ZHONGGUO XIANDAI
WENLUNJIA LUN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庄锡华 / 著

中国现代 文论家论

ZHONGGUO XIANDAI
WENLUNJIA LUN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论家论/庄锡华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6

ISBN 7-80206-296-9

I. 中… II. 庄… III. 文艺理论家—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390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论家论

作 者: 庄锡华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责任校对: 祝慧敏 徐为正

封面设计: 何成宝

责任印制: 胡 骑 柴自邦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 <http://www.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装 订: 北京新丰印刷厂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7-80206-296-9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文丛》

编 委 会

主 任：章必功

副主任：吴俊忠 赵 卫

委 员：胡经之 曹龙骐 苏东斌

黄卫平 陶一桃 吴予敏

景海峰 叶兴平 徐海波

沈金浩



序 言

本书回顾、剖析生活活动于20世纪中国文艺论坛上几位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的思想与人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视那一段充满坎坷的学术历程，力图在历史与审美两个可以互补的维度上检视这些文论家的学术成果，探讨包蕴于其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百年回眸，惊心动魄。试问人类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可与20世纪的惨烈比肩？新世纪的大幕一拉开，世界规模的战争便接踵而至。人类近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欧洲竟成了一片虐杀人类自己的屠场。40年代，法西斯德国气势汹汹地以几天抹去一个欧洲国家的速度扩张自己的版图，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扑向苏联，而克里姆林宫在灾难降临的最初一刻，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发愣，居然找不到应有的感觉。同样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将太平洋上那一个美丽的港湾变成埋葬美国舰队的火海，美国朝野却只能在一片哗然之中度过一个噩梦般的黑色星期天；被人称作蕞尔岛国的日本，居然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亚洲广袤的土地。黑云压城城欲摧，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的凶焰下呻吟，整个世界弥漫着大厦将倾的忧惧。

虽然苍冥欲坠，自有擎天一柱。在世界人民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战下，正义的力量终于艰难胜出，到世纪交替的时候，世界又恢复了常态，但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毕竟在人类的心理与行为中留下了它的深刻印记。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不管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说到底，都是为生存而战，也都得为生存而战。革命的方面、人民的方面为了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势下获得斗争的勇气与毅力，进行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广泛动员，文艺界也因之确立了一种“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战时体制，^①生活活动于这一时代，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5页。



倘若没有泯灭自己的民族正义感与社会良知，那么不管他手中操持的是笔、是枪，还是别的什么，统统都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匕首与投枪，用作于战斗。这是情势使然，毋须特别的号召。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文学及文学学术不可能作别样的选择。这就是人格的偏执、思想的偏执、学术的偏执；这就是人性人道主义成为弱势意识，受到主流文论排斥的理由；这就是视文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的理由；这就是我们赞同30年代的鲁迅而不赞同30年代的梁实秋的理由。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理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不知机变的理论偏执的通词。当战争的硝烟终于在中国大陆散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终于结束，国家重又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洗尽征尘的文学艺术理应适时地完成审美的回归、人学特征的回归。这也是我们今天更愿意听听梁实秋辈那些强调审美、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见和阅读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抒情小品，沈从文的边城系列小说的缘故。恩格斯曾经说过：“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①建国后的文学与文学学术的发展情形居然被恩格斯不幸而言中。战时体制的文学观念具有巨大的运行惯性，许多文艺理论家并没有放弃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武器意识”与“工具意识”，依旧热中于发掘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战斗功能，这就使得本来便包含片面性或具有阶段合理性的文学观点中那些不准确的成分得到了强化与扩张，而有限的合理性则早已丧失殆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文坛态势的形成，文艺理论家们虽然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由于整个社会依然充斥着十分亢奋的敌情意识、斗争意识，文学无法拉开与这种社会氛围的距离而另辟柳暗花明的发展蹊径的事实所决定的。事情不正是这样吗？这里述及的一些文论家都是富有审美经验的内行专家，他们在建国以后或早或迟地意识到了必须对和平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路径进行某种调整，以实现适应时势的转型，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发出了呼吁。他们的觉悟过程、觉悟程度及由此推动的学术活动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在他们的论著里包含了不少疗治时病的合理意见，他们的意见如果被接纳，我们今天看到的20世纪的文学景观可能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当然，总体而言，这些文论家的文学思想并没能超出历史的限制，他们所做的工作和主要的贡献，仅限于在可能的范围内缩小庸俗社会学文艺观的影响，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至否定它；甚至在他们那些现在看来十分驳杂的文学观点中也还存在许多偏差与问题，在当时与现在都备受责难与非议。但是，他们的初步觉悟及所作的批评和抵制，开启了同错误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先河，其劳绩是不应当被忘记的。我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学学术的建构与发展中，这些文论家是接力赛中跑第一棒的，没有这第一棒，也就不会有第二棒、第三棒……同时，赖有他们的奋斗和牺牲，20世纪一个多灾多难的学术领域、一个没有获得大的进展的学术领域因此浸染、纷披了悲壮的色彩，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注意到，世纪之交，文论界的一些人在反思20世纪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时，常常对我们的学术前辈发出轻薄的揶揄与哂笑，批评他们留下的也许真的有些可怜的思想遗存。但是，当我联系着前辈们生活的历史环境，当我深入探索这些前辈的曲折心路，感受他们“情投国是理求真”（胡风语）的执著与“几回追忆总凄然”（何其芳语）的内心矛盾甚至痛苦，回顾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的时候，感觉却变得复杂起来。我认为对这些文论家不作分析的指责是无知的、矫情的。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地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①认识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世代相续的绵延，更何况我们的理论前辈是在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其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他们想要取得一个哪怕是十分细小的认识进步都要进行艰苦的思想斗争、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当我们能够从容地进行新的文学理论建构的时候，必须认真检视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历程，清理前辈文艺理论家留下的学术遗产，对他们的成就与局限、贡献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这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这一代学养丰厚、经历坎坷、矢志不渝的文论家的纪念，倾听前辈们于充满艰险的学术历程中的思想表达，更是为了挖掘坎坷的历史行程中包含启示、需要记取的东西，开辟学术文化的美好未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目 录

序言 /1

导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三维解读 /1

动乱年代的学术格局 /1

学术之争，延为政争 /4

缺席的审美意识 /8

矛盾组合：胡适文艺思想论 14

文学与政治的变奏 /14

歧义丛生的文学革命主张 /20

传统的背弃与回归 /25

继承开拓：周作人文艺思想论 /32

“人的文学”的思想资源 /32

调和持中的学术方法 /35

普遍与真挚的审美追求 /40

情系生活：雪峰文艺思想论 /44

反映论的文学观 /44

现实主义理论的展开与贯彻 /51



学术失误的意外补偿	/57
理论思维的时代印记	/61
尚实致用：邵荃麟文艺思想论	/64
艰难时世中的曲折心路	/64
实用：一个时代的美学	/72
国民精神与中间人物	/79
否定与超越：何其芳文艺思想论	/88
文艺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	/88
文艺思想发展中的两次否定	/92
一颗能昭天日的赤子之心	/96
一支没有奏完的“进行曲”	/101
建国后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心理透视	/102
寻真之旅：胡风文艺思想论	/116
胡风与他的时代	/116
胡风的“五四”情结	/120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	/129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135
受缚解缚：周扬文艺思想论	/140
周扬文艺思想的基本面貌	/140
周扬文艺思想的特征	/154



周扬文艺思想的新发展	/164
了与未了的恩怨	/171
人学文学：毛泽东文艺思想论	/174
服务对象的人学界定	/175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特点	/178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学启示	/181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183
人言言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文学思想	/187
为革命而文学	/187
人性人道的张扬	/189
为审美而文学	/195
理论意义与影响	/198
结语：文论家与文学学术规范	/200
学术繁荣与学术规范	/201
知识者遭际的文化意涵	/206
思想自由与学术兼容	/213
对学术文化的理解与反思	/217
后记	/224



导论：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三维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学术历程：它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艰难演进过程中的学术、人民大众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斗争过程中的学术，也是越出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论窠臼，在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内出现了暂时困惑的学术。概言之，战争动乱构成 20 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背景，并提供了求解 20 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许多学术难点的钥匙，脱离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便无法理解 20 世纪中国文论的特征形态及其价值取向。

动乱年代的学术格局

随着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入侵，频仍的战乱便打破了古老中国往日的宁静。进入 20 世纪之后，又有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它留给这个多难国家的不仅是迭经战火洗劫后的断壁残垣、遍地饿殍、满目疮痍，而且还有残酷的厮杀后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仇恨、嫌隙。

在审察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文化背景时，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五四”后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民主”、“科学”的宣传深入人心，并因此理想化地认为中国可以在摆脱了专制统治后如释重负地成为民主国家，加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说是“咸与共和”，但帝制复辟的闹剧也接踵而至；专制统治依旧，军阀们相互混战，外国军事势力的入侵，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与战争给 20 世纪包括文学学术在内的思想文化领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安定环境中的焦躁与敌对战阵间严重的对立与仇恨，对学术进程造成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终于在这片多难的国土上诞生，人们重新看到了和平生活、重建家园的希望。但新生的中国长期受到战争的威胁，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间的争斗摩擦及由此形成的冷战思维，构成和平时国内政治与文



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只要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扫描 20 世纪文艺理论走过的坎坷道路，便能使诸如学术政治化及文学理论对于文学审美特征的漠视这类聚讼纷纭似乎不易解开的理论之结获得求解的线索。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拼杀，没有任何调和、妥协的余地。从中国当时的情况看，革命的方面、人民群众的方面长时期处于劣势，因而必得要设法保持极大的革命的亢奋。这种情景，让我想起马克思描述的 18 世纪欧洲新兴的然而又是处于弱势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们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而将自己的情绪调动至同样是高度亢奋的程度的状况。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① 由此可知，将情绪调动至悲剧的愤激程度，是战场上处于劣势的一方为了赢得战争必需具备的精神状态。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正是这种激愤的情绪左右着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形成该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独特的语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为政治服务遂被当作极正当的道理。当文学被视为战斗的武器，不再以自己审美的存在给人以感染陶冶的精神享受的时候，我们又怎能要求为这样的文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的文学学术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纵览 20 世纪的中国文论景观，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形成了文化体制上的战时格局，各种社会力量按照自己的治国理念、政治目标构筑起自己的思想文化营垒，并进行广泛持久的战时动员。

我们知道，20 年代的苏联“拉普”十分推崇文学的所谓“组织”功能，拉普的理论虽然在 30 年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但“组织”文学的观点却照样大行其道。在战争年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将同情于自己、或者从属于自己的文学家“组织起来”，开辟一条同敌对一方进行斗争的思想文化战线，并欲通过他们创作的作品的精神渗透力、思想感召力去“组织”群众。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来说，因为急需思想文化界的援军，建立这样的文化体制尤为迫切。30 年代黄浦江畔文化上的围剿与反围剿见证的正是这样一种事实。毛泽东称 1927 年至 1937 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6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① 他说，国民党方面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毛泽东由衷地赞美了反围剿的战果，他说：“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② 毛泽东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现实的也是严酷的文化格局。在这种文化格局中，有特务、有监狱、有杀头，左翼作家此时更关心的必是政治斗争的成败，而不是创作业绩的优劣。30年代的左翼作家似乎忘记了他们的作家身份，怠慢了、辜负了手中那支本应当写出锦绣文章的如花妙笔，奋不顾身地参与到现实的政治斗争。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把左联当作一个政党组织而不是文艺团体看待的主要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因为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进入和平建设时代的中国，文艺界的领导者们始终保持了战时“组织”文学浓厚兴趣与思维方式，动荡时势中形成的文化体制被原封不动地搬运于和平建设时期。

毛泽东也是这种“组织”文学观点的拥护者与践履者。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他明确地将文学艺术称之为革命战争中的一条战线，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③ 因此，毛泽东为这次座谈会定下的基调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② 《毛泽东论文艺》第16页。

③ 《毛泽东论文艺》第46页。



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文化的军队”必是一支组织严密、有纪律约束的队伍，一支能够随时投入战斗的队伍。文学艺术的战斗功能引起了这位伟大战略家超乎寻常的注意，毛泽东后来经常出面协调文化工作，正是基于他对文艺的这样一种理解；许多文艺界的领导者也习惯且十分热心地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领导平时时期的文艺事业。20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本来已经变成了有“组织”的、非学术的围攻，但总算还属于“文争”的范围。但领导人措辞严厉的批示和公安机关的介入调查，瞬间完成了学术向政治的转化，胡风在这种“学术争论”与对敌斗争的双重夹攻中不幸落入重围。学术论争鬼使神差般地越出了思想文化的界域，蜕变为对当事人政治忠诚的拷问，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学术的是非总是要通过政治划线来判明，斗争声讨、大批判、政治评估等非学术手段成为很长时期中解决理论分歧通行的做法，生活活动于该时期的文学学人逃脱不了整人与挨整的历史安排。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自己在各种批判整肃运动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像巴金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坛耆宿也对自己在高压下被扭曲的思想言行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

其次，与思想领域内的战时体制相适应，文学学术研究的运作方式、思维特征也都带着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刻印记。具体来说，激烈的政治斗争对20世纪文学理论的影响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1. 批判与建设脱节、批判与建设不成比例，批判便是一切。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领域里自如地将消极的批判与积极的建树相结合，在批判中全面系统地正面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学术境界相距甚远。2. 学术论争不仅未能促进不同观点间的互补与采收，相反，激发了对立观点间的敌意。胡风与周扬本来是好朋友，胡风与鲁迅结识也是因为周扬的介绍，30年代他们在关于典型问题上发生争论，随即反目，难解心结。3. 学术讨论容易引起非学术力量的介入，思想分歧往往采用非学术、超思维（恩格斯语）的方式解决。上个世纪初林纾曾经要求北洋政府清除北大的那些倡言文学革命的新派文人，30年代许绍棣曾经通缉过“堕落文人”鲁迅，50年代又有许多文学界的人士上书当局，要求惩处反革命分子胡风。

学术之争，延为政争

“学术之争，延为政争”，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初以后学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47页。



术转向务实，学人们政治兴趣大增的一个概括。实际上，学术的政治化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传统，并构成学术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势越往后，越激烈、越频繁。在我看来，20世纪学术政治化不过是民族文化思维定势的惯性延续及在特殊情景下的强化。研究这段文学史的学者曾发出过这样的浩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和政治的关系太紧，太密切。文学对政治来说，始终没有独立过，大概也很难独立。要么是文学主动去依附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要么是政治找上门来干预文学，向文学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文学配合政治。”^①其实，即便是对文学审美特性认识甚深的鲁迅，在“忍看朋辈成新鬼”后，“怒向刀丛觅小诗”，也将自己的创作兴趣转向可以负载更多政治信息的小品杂文，因为，小品杂文在他眼里，是投枪，是匕首，且能快速成文，更能满足他的战斗需要。

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是学术政治化的重要特征。胡风与周扬等人的思想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其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定位居然成为论争的一个焦点。1935年初胡风在评述刘半农的杂文集时写道：“‘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这个反帝运动虽然是由于一种新的要求，但当时的观念基础非常朦胧。”^②又说：“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胡风对“五四”的上述分析，因为没有在反帝反封建前加上“彻底”一词，后来便成了胡风贬低“五四”的一条罪状。然而“彻底”一词是毛泽东在40年代评析“五四”时加上的，胡风是一个文化人，怎能要求其其对“五四”有如此精准的体认呢？同一时期的茅盾不也与胡风一样将“五四”看成是由“市民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吗？我们注意到在现当代文学思潮史上，文学观念的论争往往在学人们的弱项——政治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尽管胡风从政治层面对“五四”运动性质的认定包含一些不确定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五四”划时代意义做出高规格的评价。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受到“五四”哺育成长起来的新人，他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前辈身上，看到了拓荒者的勇气与坚毅，并深深地服膺于这种精神。对“五四”的评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五四”的崇敬，在他已经落实在大众化讨论中对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的捍卫上，这也是他后来在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

① 马良春、张大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第41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② 《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题的讨论中对向林冰一派否定“五四”传统极度反感的原因。

学术问题通过政治方式最终解决是学术政治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国内历史学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在这场学术研讨中,因有领导人允许争论的发言而显得极为热闹,讨论中形成了学术上的均势,这种均势又激活了学术思维,使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得到了深化;与此相对照,哲学上“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争论也因有领导人的介入而出现了“一分为二”一派的独秀局面。文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与胡风的学术分歧是通过政治清算而告结束的,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周扬也在另一场范围更广、性质更加严酷的文化批判运动中关进了曾经关过胡风的秦城监狱。

20世纪包括文学学术在内的政治化趋势的动因是相当复杂的,总的来说,它是外部需要与内部需要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外部需要看。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各种社会力量分化重组的动荡时期。社会处于乱世,乘势而起的各种社会力量除了竭力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军事局面外,也都迫切希望获得各种思想意识形式的有力支持与配合,希冀在思想文化方面给予合法性、合理性的说明,实现其政治的、思想的动员。政治需要文化施加影响,但文化对政治影响的性质则要由政治来决定与框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反思建国后艰难的学术历程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使用频度很高的词语:禁区。说“四人帮”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设置了许多“学术禁区”、“理论禁区”。我们不禁要问:形而上的精神思想领域何以能划定有形的禁区,探求真理、秉性自由的学术研究何以会在禁区前趑趄不前?答案是明确的:这一切皆缘于对敢于涉入禁区者的有形的制裁。一旦学术人士在从事自己的著述时产生身家性命的顾虑,又怎能心无旁骛地去寻找真理?当学术人士时常感觉到社会对他们充满疑忌、十分冷峻地凝视时,谁还敢越出已有定论的界限,作雷区的旅行?前车之辙可鉴,谁还敢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对令人不堪的前路作无谓的蹈袭?痛定思痛,新时期复出的周扬因此特别强调要摒弃非学术的干预,提倡学术讨论中的自由建言。1980年,在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筹备会上他真诚地告诫文学界的朋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主要精神就是提倡自由地、平等地、同志式地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凭讲理,不凭权势;在学术、艺术问题上,领导人不



要轻易地下结论，以免妨碍自由讨论的发展……”^① 然而对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前景相当看好的周扬，看来还是过于乐观了，旧的文化体制、旧的思维方式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后来居然为一篇纯学术的论文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

从内部需要看，首先，政治干预学术，在强使学术接受自己的意志，使一部分学人受到伤害的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在这一干预中获益。既然政治干预能够使他们在这些干预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又如何能遏制这部分人对政治干预生出更多“非分”的欲求与期待？在一个不正常的文化氛围中，他们招引非思维、超思维力量干预学术的要求显得特别强烈，其原因不外乎：希冀不作艰苦的理论探索，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权威；或者在被论争对手揭出了许多学术上的纰缪、理屈词穷时却不愿意进行深刻的反思，更不甘于因此拱手让出精心营造的话语霸权。看来，政治干预学术的局面屡见不鲜，也同学术界在这方面有很强需求有关。20世纪30年代部分左翼作家为排挤胡风，蓄意构陷胡风通敌的罪名。甚至到了80年代后期在关于主体性问题、文学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时，还有人寄希望于“上纲上线”，把对方的学术观点抬高到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高度，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用行政手段介入纯粹学术性讨论的做法被人们摒弃，学术自由的新风尚正在形成。

其次，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学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往往带着非学术的寄托。在中国，不管生活于哪个时代，以天下自命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总是不能忘情于政治。中国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身处乱世，欲有作为，所能凭借者不过著述而已，他们越是想有所作为，越是会将政治兴趣寄寓于篇籍。王国维在他的《近年之学术界》^② 中曾经指出：“庚辛（1900）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邵荃麟认为当时的文艺之所以与政治如此联系紧密，“与其说是由于政治家向艺术的要求，毋宁说是一定迫切的情况之下艺术家自身所感到的难以抑制的战斗要求。”^③

① 《美学》第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②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③ 邵荃麟：《诗与政治》，《邵荃麟文学美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